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郵票

1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郵 票

1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

總顧問	鄧力群		
主任	王忍之		
副主任	龔心瀚	于友先	劉忠德
	房維中	劉積斌	
常務副主任	許力以		
委員	啓功	廖井丹	高明光
	張文彬	謝辰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輯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啓功

常務副總編輯 趙敏

副總編輯 邵宗遠 劉玉山 張圀生 吳士餘

委員 (按姓氏筆畫為序)

于永湛	王朝聞	王樹村	王琦	王伯揚	艾中信
朱家緝	沈鵬	李學勤	李書敏	宋鎮鈴	金維諾
周誼	林文碧	吳士餘	吳成槐	吳鵬	馬承源
段文杰	俞偉超	邵宗遠	姚鳳林	陳允鶴	陳宏仁
孫振庭	奚天鷹	啓功	寇曉偉	張仃	張圀生
常沙娜	許力以	清白音	楊伯達	楊牧之	楊新
楊瑾	楊純如	趙敏	趙志光	趙貴德	鄧白
樓慶西	劉玉山	劉振清	劉建平	劉慈慰	樊錦詩
閻曉宏	謝稚柳	關山月	羅哲文	龔繼先	

1986年至1997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總編輯、副總編輯及編委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吳作人 劉杲

委員 袁亮 張德勤

總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邵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瑾 龔繼先

委員 古元

凡例

- 一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是《中國美術分類分頁全集》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國美術全集》60卷古代部分的後續延伸，二者為有機的組合體。
- 二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分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建築藝術、書法篆刻等編，每編分若干卷。
- 三 本卷為工藝美術的郵票卷1
- 四 本卷內容分三部分：(1)總序、序，(2)圖版，(3)圖版說明。
- 五 本卷圖版基本按作品產生年代為序。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顧問 古元 張仃 關山月 王琦 周干峙
主任 劉玉山
副主任 王伯揚 陳宏仁 張文學 劉建平
委員 (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伯揚 朱乃正 朱秀坤 李路明 周韶華
吳鵬 林瑛珊 陳宏仁 陳惠冠 奚天鷹
常沙娜 張文學 張炳德 程大利 楊力舟
靳尚誼 趙敏 劉玉山 劉建平 錢紹武
鐘涵

本卷總顧問 劉立清
主編 張仃
副主編 張文學
執行編委 張建斌
編選委員 (按姓氏筆畫爲序)
邱凌 周令釗 武必端 袁運甫
陳芳烈 陳文騏 靳尚誼 楊汝戩
鄧文凱 鄭德海 盧天驕 龐邦本

圖片攝影 張英才

總體設計 呂敬人

前言

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時間久遠來講，已有五千多年歷史，這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覆蓋的面積來講，可有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區域，也是中外人士都已看到的；若從它的構成因素來講，恐怕瞭解的人士就比較不太多了。

無論研究中華文化史或欣賞由此文化所構成的美術品的人，沒有不驚歎它的燦爛、豐富而有應接不暇之感的。如果探討其原因所在，就會理解到絕不可能僅是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能獨自創造完成的。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自古即隨時隨處，互相習染、互相融合，才有現在所見的驚人燦爛的文化及其成果。

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幾千年前已建立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已不存在或雖仍存在却曾中斷過一段時間的并不少見。而我們中國則綿延數千年歷史未曾中斷，甚至某個事件的日期，古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和出土文物銘刻相吻合。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雖也曾有些小段為某些兄弟民族掌了政權，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份，沒有割斷中華文化傳統，所以說中華文化是五千多年綿延未斷的文化，可稱當之無愧的。

幾年前，中央宣傳部組織了眾多的文化、文物工作的專家，編成《中國美術全集》六大冊。出版以來，讀者眼界大開，這六十冊書起到了現有的任何博物館及任何文化藝術史的論著都無法取得對人民的啓發、教育作用。事實很簡單，無論哪個博物館，哪部研究、介紹這類學術的著作，都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些陳列品和實物

的直觀插圖。凡有過閱讀、研究這類書籍的人都知道，讀千百字的文字說明，不如看一眼實物，那麼能一次瀏覽這些圖片，豈不“勝讀十年書”！

現在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擴充、提高。文史書籍的搜集、重印，以及從種、角度加以整理傳播，已取得普及與提高的極大效果，而美術方面也不容無所擴展、充實。由於原六十冊的內容難以盡納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品，而且新發現的文物珍品也有待補充，更有些近、現代的優秀作品，反映中國文化藝術新發展的，過去還未及選編，現在亦應納入。於是領導上再次組織羣力，在以前六十大冊的基礎上翻成幾倍，編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預計約有三百餘冊。這部新編巨著中，藝術種類雖然變動不大，但在每一種類中并非只數量加多，重要在盡力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名品。

本書所收各類藝術名品，以國內、境內公、私所藏為主，國外、境外藏品中最重要的名品具有代表性的，也酌量收入。至於近期最新發現以及最近出土的，由於編輯印刷工序關係未及補充，俱有待於續編工作。

這部巨著成書，我們雖然足以自慰，但從中華文化中美術類的全部來說，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世界的廣大專家，能把它看成是中華文化中美術部份的扼要介紹，才較符合實際。現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共同敬願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啓功

一九九七年一月

總序

新中國的 “郵票藝術”

張 仃

解放前，很少注意和關心郵票，不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祇把它作為郵資的印迹，猶如購物付稅的印花而已。

共和國建國之初，由于工作需要，當時我在中南海負責政協、人大、天安門等開國大典典禮的藝術設計工作。這時郵政部門派孫傳哲同志來說，要求設計開國紀念郵票。當時工作繁雜，創作條件簡陋，遂以鉛筆繪製幾幅草圖。畫面上以中南海正門、天安門、宮燈、政協會徽、毛主席演說揮手等形象構成。孫傳哲同志拿走草圖，去研究刻版印刷，跑工廠，很快便把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和第一套開國大典紀念郵票印製出來了。

我到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工作之後，由于深感社會需要，有意識地在裝潢設計課中，增加了郵票設計課題。從畢業生中為郵電部分配了第一批郵票設計人才，他們有：邵柏林、劉碩仁、韓象琦、盧天驕、董純琦等。

此後，郵電部又成立了郵票設計評選委員會，當時主要成員有裝飾藝術家張光宇、周令釗、邱陵等同志，我亦參與其事。為了擴大郵票設計稿源，曾多次廣泛向社會徵稿，如《水滸傳》郵票的作者，就是從山東發現的。

現在除郵電部門有豐富經驗的郵票專業設計機構外，社會上有水平的人才也很多，所以近年來我國郵票設計藝術不斷提高。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國的郵票藝術，從無人過問，到有組織有計劃地從人才培養到國家郵票部門組織管理，能及時配合政治任務和社會需要，新中國的“郵票藝術”才有了自己的獨特面貌進入21世紀。

1998年秋于北京

序

方寸見天地 道法循自然

袁運甫



普1 大龍郵票
普1.1 大龍薄紙



普1.2 大龍闊邊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郵票》卷終於問世了，這是中外集郵界、藝術設計界、美術界所欣慰的事，它的出版必將廣泛地為社會矚目和歡迎。中國有2000萬人的集郵愛好者，僅此一巨大的數字，我們為其奉獻這樣一冊專集，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一個創舉，自1840年5月6日人類社會誕生首枚（英）郵票《黑便士》和《藍便士》以來，還不記得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既着眼于它的整個郵票設計歷史，又着重于郵票設計藝術這一雙重意義的質量標準，由編委會集體討論、慎重挑選評定，最後形成了這樣一部起始于中國第一枚《大龍》郵票，截止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為止的逾百年歷史的郵票集成。《郵票卷》總計收入中國各個時期設計、發行的郵票616種，共2659枚。其中清代收入本集的共23種，132枚。中華民國郵票收入本集的共30種，187枚。解放區郵票收入本集的共119種，429枚。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收入本集的共418種，1803枚。

這裏應予說明的是，《郵票卷》儘管有其自身的獨特要求，但是作為中國現代美術創作和設計作品的入選，還必須首先遵循總體藝術質量的把握，總體容量和限額的制約，以及各個不同時期特色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地總會出現忍痛割愛或是挂一漏萬的偏失。但是從中國郵票設計發展史來看，我們總算有了一部能夠概括歷史全局的構架，即使仍有可補遺和匡正之處，那也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為後繼者已經提供了比較完整的框架和基礎。

一、中國古代郵驛制——首枚《大龍郵票》誕生

郵票是現代郵政的郵資憑證，人們都說郵票還可稱之為一個國家的“名片”。它又以藝術上的精美和豐富的內涵引人喜愛，成為人們通信來往，傳遞友誼的載體。因此全世界億萬人都珍視郵票藝術。

郵票的語言和內涵是世界上最為豐富多彩和包羅萬象的知識庫，它好比是一部百科全書，人們還稱它是“沒有圍牆的大學”。面積雖小，含量很大。

郵票的這許多重要的特點，把全世界古已有之的以傳遞文書、接待使客、轉運物資等等的國家郵驛組織和系統進行了重大改變。

當然，這種改變正是基于現代文明推動社會發展的結果，是蒸氣機和動力科學促進了交通工具的全面變革，速度和管理成爲現代社會運作的關鍵，因此海關、郵政等都應運而生。郵票的產生，或者說郵驛改變爲郵政的管理形式，也是時代發展和進步的必然結果，我們從中國古代郵驛制度的演變過程就能清楚地看到郵票誕生的歷史進程以及它對現代社會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1992年人民郵電出版社編著出版的《中國集郵百科全書》中劉廣生先生等專家對中國郵驛史的研究，已經爲我們提出了十分詳盡的以史爲據的權威性論述，本節僅就此摘錄部分內容提供給讀者參閱，以了解中國郵政和郵票事業發展的史實，也許從中更能對郵票設計的意義和社會作用有一個全面了解。

中國是世界上最先建立通信組織的國家之一，以史實記載爲據，也有三千多年了。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通信組織活動的記錄。周代郵驛的組織更爲具體和明確，如設烽火臺，與擊鼓傳聲相配合，所謂“烽可遙見，鼓可遙聞”，是視聽兼備的。春秋戰國時各國都設郵傳組織，當然也多用于傳送緊急事情。孔子說“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郵速已爲社會關注和重視。秦代郵驛的發展更與秦王國的統一和法度規一緊密聯系，書同文、車同軌，并嚴格“規範了傳令封發交替的制度，如實行公文接力傳遞，對公共官員經過郵傳的食宿標準都有級別規定等”。秦簡《行書律》記載“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日月夙暮”，“宜到不來者，追之”。這些制度亦爲後世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漢代郵驛多承秦制，但漢代更完善了許多驛程的制度，“它廣置郵亭。改郵爲置，五里一置，步行傳遞爲主，驛則三十里一置，并以輕車快馬傳遞緊急軍令。”《後漢書·西域傳》所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當時開闢絲綢之路，溝通了與古羅馬帝國和中西亞各國的信息。還“實行州、郡、縣三級郵驛管理，中央專人統管負責”。留存至今的壁畫中，還可看到不少驛使急遞信札文件的如實描寫，那飛馳的單騎，有力的造型，也說明了當時的郵驛效率已經非同一般了。到了唐代，國力强盛，“唐玄宗時全國有郵驛1643處，其中陸驛1297處，水驛260處，水陸兼驛86



普2 小龍郵票
普2.1 小龍毛齒



普11 紅印花加蓋暫作郵票



普14 倫敦版蟠龍郵票(無水印)



欠3 倫敦版第二次資欠郵票



藏1 倫敦版蟠龍加蓋西藏貼用郵票



紀2 宣統紀念郵票

處；驛有官吏主持，稱驛長，驛丁由附近民衆輪流服役。”唐岑參詩《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云“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當時郵驛的繁榮景象真是歷歷在目。宋代郵驛也有變革，“實行郵、驛分設，建立步遞、馬遞、急脚遞組成遞鋪通信系統，驛只是交通與館舍組織，驛距擴大為六十里，每十里或二十里設一遞鋪。并以軍卒代替百姓驛丁。”元代郵驛也有推進，“全國陸驛有馬45,000匹，驛站有車3900輛，水驛有船5921隻，元代郵驛已能溝通中外，東至鴨綠江，通達高麗全境，北到西伯利亞，南臨安南，西達波羅的海和波斯灣，并有層次地設崗管理全國郵驛事務。”明代洪武元年初更為郵驛發布詔令，“設置全國水馬驛站，遞運所，急遞鋪，分別負責飛報遞送軍情，遞送使客，轉運年需以及通信文書等。”但在明代中後期因廢驛政而導致嚴重混亂，弊病叢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又恢復并整治了郵驛，“驛站官養官應，注重效率，同時還努力擴大了各少數民族地區的郵驛組織。”至清末，郵驛又行衰微，以致失去作用。這也是由于社會的發展已經不適應這種郵驛的方式。清末資本主義生產形態日益活躍，當時國內外互派使節以及商務活動的開展亦導致了更大範圍的通郵與物資交流的需要，因此建立國家的海關和郵政設施也成為必不可少的了。歐洲從16世紀起，郵政通信已經開始超越國界，并出現了國際性交往的郵政業務。到18世紀時這種活動亦隨火車、輪船等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郵政業務的發展，并于1874年10月9日成立了總部設在瑞士伯爾尼的“萬國郵政聯盟”。此後4年，清朝于1878年決定由海關兼辦郵政，向公眾開放收寄郵件，并在同年由清海關郵政發行了《大龍》郵票。它成為中華民族漫長郵驛史的重大革新，中國現代郵政事業也隨着《大龍票》的誕生而發端和發展了。

二、清代郵票綜述

1878年中國清代海關兼辦近代郵政，并向公眾開放收寄郵件的業務。同年清海關郵政發行以龍為圖案的郵票，俗稱《海關大龍》票。後又印《海關小龍》票，并以太極圖水印紙印刷，開創了中國第一套水印紙印刷郵票的記錄。在此之前的清代郵政是由“海關試辦”并只收發外文信件，試辦歷經12年之久才向社會開放。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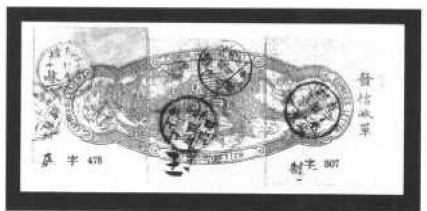
當時的郵政實際上是受外國列強控制，如1894年11月7日慈禧太后六十壽辰的紀念郵票——《萬壽》郵票，即由赫德建議發行，費拉爾設計，印數高達172萬枚。又如1897年光緒皇帝親批正式開辦“大清郵政官局”，居然等了4年才于1911年5月28日落實設立官局。其局長是由鐵路局長兼任，但無實權，實際的權力仍操縱在外國人帛黎手中。中國郵政管轄權在相當一個時期裏被外國列強侵占，他們擅自在中國開設的郵局多達344處。直到中華民國外交部于1921年照會當時各列強國家駐中國大使館要求迅速撤銷後，方于翌年全部停用外國郵局。僅日本一個國家就撤銷了在華郵局66處。

清代設計發行的各種郵票總共20餘套，大部分均已收入本集。其中除《大龍》票深受國內外集郵愛好者的重視外，《紅印花加蓋郵票》亦為行家視為佳品，尤以《紅印花小字一元票》為清代名貴品種，存世僅31-32枚，其四方聯更被譽為“東半球最罕貴之華郵”。這“紅印花”是1897年清代國家郵政利用上海海關紅色收費憑證加蓋改作的郵票，因曾被誤認為是印花稅票而得名。原票面值3分，分紅色、朱紅色、絳紅色，雕刻版印刷，由英國倫敦華德路公司承印，共印100萬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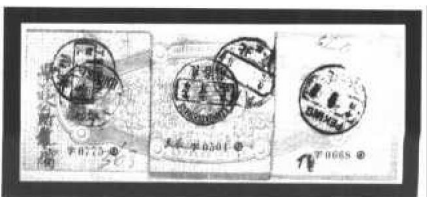
清代的郵票藝術，雖然有外國人參加了設計、印製工作，但是在藝術風格、主題內容、郵票個性等方面，依然具有比較突出的中國傳統特色，莊重嚴肅，尚求端正。在選材和形象上也是圍繞着龍、蟠龍、帆船、飛雁、花飾、壽慶文字等，在平面設計中多使用開光、對稱分割等比較嚴謹的手法。因色彩上多采用一色印刷，因此在觀念上比較注重黑白效果和均勻配置的空間比例。字體亦多楷體、宋體、黑體等較古樸規矩的風格。在清代郵票設計中以1878年海關發行的《大龍郵票》最為簡明精練，圖幅22.5mm×25.5mm，沒有任何多餘的附加物，井字結構的畫面設計中，形象和文字都各得其所，郵票正中是立幅的正面大龍形象，威武而生動，它采用中國白描的裝飾手法，把大龍造型于中心部位，既清晰又端莊。另外，紅印花加蓋“暫作郵票”。在設計手法上也是很有獨特效果的，它采用四角紋飾布局構成單一的裝飾性畫面。紅底黑字，印有“大



欠1 倫敦版蟠龍改作欠資郵票



快1 一次快信郵票13頁



快7 七次快信郵票



普 2.2 小龍光齒



臺 6.3 第三次獨虎郵票



普 6 倫敦版帆船、農獲、版坊郵票

清郵政”和“暫作”面值字體。

“郵票”始出英國，風行歐美，因此清代郵票設計的總體中國風格中，也同時流露了一定的西方影響，特別是西方古典建築的風格影響，如古羅馬和希臘的廊柱和門窗等的建築型制和樣式化的結構處理等，在早期郵票設計中都有一定的反映，這一類設計格局在貨幣票證中也是屢見不鮮的。

清代郵票設計的色彩選擇，應當說是具有較高鑒賞眼光的，這為中國的郵票色彩開了一個好頭。我認為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色相的單一認定，而是十分重視色彩明度和純度的相互關係，是兩種顏色或兩種以上顏色的復色混和，這在清代不少郵票的設計者英人“費拉爾手稿”裏可以證明。例如他在《小龍郵票》的印色報告中提到色彩規格寫的是：“綠色、紅紫色、黃褐色。”他在1894年11月17日發行的《太后壽辰》9枚紀念郵票的印色報告中寫的是：“紅色、寶石綠、明黃色、玫瑰紅、鉻黃色、棕色、暗綠色、橘黃色、洋紅色”，而且注明其“顏料是Kast&Ehinger生產的”。費拉爾在談到另一套郵票色彩的要求時，他注明的色彩要求是：“寶藍色、淺棕色、淺鉻黃色、鮮紫羅蘭色、朱紅色、深藍色、鉻橘黃色、紅棕色、寶石綠、鮮紅色。”等等。當時發行較大的明信片也如此，在紙張質量、印刷質量以及色彩等方面都有明確的嚴格要求，12種明信片有12種不同的色彩要求，而且對每一種顏色都提出了很專業化的設計建議，如綠色要區分出“鉻綠色72KE、鮮綠色74°KE五、艷綠色79KE。”如藍色之外，還注有鈷藍色。紅色類提出了“朱紅色36KE、紅棕色116KE、粉色129°KE、玫瑰紅45KE、猩紅153KE”。這些色彩問題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文字可考的時間是1894—1897年期間清代遺留的郵票設計“備忘錄”。悠悠歲月流逝了，它對今人的色彩思考亦提供了有益啓示。在藝術設計中，色彩是最直覺的領域，豐富的色彩世界應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先進的色彩印製技術也已經達到無所限制的地步。技術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設計者的色彩品味和色彩修養，以及其體現于具體設計的微量差別，這裏存在着眼力、經驗和微妙的色彩觀念的認知。

清代郵票存在的大問題是設計風格的單一和模式化、定型化，視“皇帝和衙門的批准和贊賞”為最大滿足，因此大龍、小龍、蟠龍……成爲俯拾皆是形象，藝術的創造性必然枯竭了，廣大人民群眾多方面的審美欲望是不可能受到重視的。藝術僅僅是爲了朝廷的歡欣，變成了一種模式化了的“標志”，它與社會生活、大自然是沒有關聯的。因此，這樣的藝術也很難得到更大的發展。或僅僅是爲人們留下了那一個時代的文史意義的價值。

三、中華民國和解放區郵票綜述

中華民國（1912—1949年9月）設計、印製、發行的郵票，本集收有30種、187枚。

與此同時（1927—1950年6月），由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設計、印製、發行的郵票，本集收有119種、429枚。

中華民國時期由于國內外政治、經濟、金融的不穩定，因此反映在郵政方面的狀況同樣如此，幣制多次變動，屢屢貶值，如1948年8月金圓券1元兌換法幣300萬元，當時只能發行無面值的單位郵票，按牌價出售。或是發行基數郵票，基數面值以銀圓計算，折合當時流通貨幣出售。1949年7月又發行銀圓券，郵票面值以銀圓計算。由于類似問題和各種難以預料的情況，當時郵政亦多采取“加蓋”章印，“畫綫面值”，“暫作”面值，“改作”面值以及所謂加印郵政“中立”，加印“臨時中立”，小小的郵票上面不堪負重，而且在社會上流通甚久。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勝利之後，1912年4月中華民國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北洋軍閥袁世凱任總統，就用清朝《蟠龍郵票》加蓋“中華民國”字樣爲郵票，據記載總共加蓋的這種郵票有8,716,364枚之多。

自1912年12月發行以孫中山像爲主圖的《中華民國光復紀念》郵票後，1929年才決定發行以孫中山像和辛亥革命烈士鄧鏗、陳其美、廖仲愷、朱執信、宋教仁、黃興像爲主圖的普通郵票。1931—1949年4月共發行各版別孫中山像郵票27套243種，1932—1940年共發行烈士像郵票2套50種。這兩套以人物胸像爲主圖的郵票設計，大體是井字結構，中心的橢圓形爲人物像，四角爲面值，兩



普36 郵政儲金圖郵票



普11 倫敦一版孫中山像郵票



紀1 中華民國光復紀念郵票



紀 11 中華郵政開辦四十周年紀念郵票



紀 12 美國開國百五十周年紀念郵票



紀 23 教師節紀念郵票

側豎以西式立柱，上梁正中為國民黨徽。這種格局基本上亦代表了這個時期的郵票風格，也可以說是“大龍”郵票風格的繼續和發展。

在中華民國成立至1949年的37年中間，還有不少中國郵票史上的首發票，例如1921年發行了中國第一套《航空郵票》，1939年發行了《美國開國一百五十周年紀念郵票》，在美印製并為中國首次發行的雕刻版與膠版套印的郵票。1941年6月發行的“節約建國郵票”以農田、礦產、工廠、水陸交通為圖，全套6種，雕刻版印刷，是中國第一套特種郵票。1932年6月發行的《西北科學考查團紀念郵票》，以故宮博物院藏元代中國畫《平沙卓歇》為圖，是中國首枚名畫圖案郵票，共4種，全部雕刻版印刷。這次共印25,000套，郵票面值2角，其中20,500套按面值供應考查團，由考查團提價5元轉售，盈利作為科學考查經費，這也成為中國首次發行的特別資助郵票。

這裏還應提到的是1912年初，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設計的《飛機圖》普通郵票；後因中山先生解職而只有雕刻版試樣，未予發行。世存僅一枚，40年代由邵詢美收藏。另有《統一紀念》印樣郵票，以孫中山、蔣介石、張學良三人肖像為主圖，雕刻版單色印刷，世存稀少，未予發行。這兩張未發行的郵票在設計上是十分用心講究和結構嚴密周到的，同時主次分明，大方完美，相互襯托有力，特別是弧綫的使用和明暗處理均恰到好處，可以說是民國郵票中的藝術設計精品，惜未發行。

這一時期的郵票藝術，從總體設計上來說，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和發展，但是從生產工藝來看，多在國外生產精印，質量上有一定的保證。個別雕版印製工藝特別是肖像技術和未發行的《飛機圖》（附圖）、《統一紀念》（附圖）印樣等的藝術效果似應稱之為大家手筆，無論是總體表現能力或是圖案結構的水平以及形式風格的畫面把握都應當說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解放區（1927—1950年6月）設計、印製、發行的郵票，本集收有119種，429枚。

中國解放區郵票包括三個時間，即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戰

争時期郵票；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郵票；1945—1950年6月解放戰爭時期郵票。在1927—1949年整個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中國解放區共有171個地區，設立有199個郵政機構，共發行了448套、1888種郵票。它同上述中華民國郵政郵票是并立的關係。直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中國人民郵政并發行郵票為止，中國解放區郵票亦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本集共收有解放區各類郵票119種，429枚。其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郵票僅收有12種，30枚。當時戰爭環境極其艱苦和困難，許多郵票均未能保存下來，收入本集最早年代的解放區郵票是1930年發行的贛西南赤色印票，面值一分，藍色，其圖案是仿照中華民國1925年9月發行的印花稅票繪的，中間直列“贛西南赤色郵政”7字，幅面為24mm×19.5mm，另有《閩西赤色印花郵票》兩枚，也是1930年發行的。均以五星中間有鐮刀和斧頭的黨徽為圖案，印淺棕色與紅色。

1932年5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郵政總局，統一管理中央蘇區的郵政。同年5月起陸續發行了1套8枚的郵票。圖幅22.5mm—24.5mm，是石印無孔，銀幣券郵票。這套郵票的設計形象生動豐富，充滿戰鬥的豪情，同時運用了明晰的線條和強烈的黑白處理，通過地球、五星、黨徽、衝鋒、宣傳、工農團結、行軍、旗幟、光芒等內容歌頌了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勃勃生機。由于是在戰爭劇烈的環境，不可能提供安靜的條件，因此在鮮明主題的刻畫同時，也發揚了豪放、激情、自由、即興的戰地氣息。解放區的郵票創造了十分可貴的設計新風格，它沒有任何過于雕鑿描繪的痕迹，它強烈地在藝術設計的表現過程中突出了精神的力量，這是一種崇高的革命意志和情感表現力，它沒有也不可能依托直線筆、圓規、三角尺作為繪圖工具，陪伴它的不是輕音樂，而是槍聲炮聲和衝鋒的號角！風格和藝術相融，它來自生活。綜觀清代—民國—解放區郵票設計的歷史過程，無不體現了這一共同的客觀規律。

在40年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發行的郵票都繼承了30年代土地革命時期的郵票藝術特色，同時也取得了新的



K.HZ-3 “稿”字郵票



K.HB-19 牛耕、擲彈圖郵票



K.HB-20 第一版毛澤東像郵票